

李下蹊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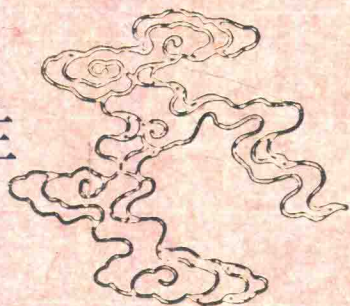
下

庆祝李伯谦先生

八十

华诞论文集

◎ 何弩 主编



科学出版社

李下蹊华

——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下册)

何 弩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全 2 册 / 何弩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2

ISBN 978-7-03-051745-6

I . ①李… II . ①何… III . ①商周考古 - 文集 IV . ① K87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5598 号

责任编辑：李 茜 范雯静 / 责任校对：邹慧卿 彭 涛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2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58 插页：1

字数：1 375 000

定价：520.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陈梦家先生青铜器研究成果考述

王 睿

(故宫博物院)

陈梦家先生(1911~1966年)在甲骨文、青铜器、古文字、汉简乃至古代度量衡等诸多研究领域都有涉猎,他短短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长长的书目《殷墟卜辞综述》^①《西周铜器断代》^②《汉简缀述》^③等,他对某一字的解释、某件青铜器的断代和铭文的释义,不论你赞同与否,都是注释条目中必备的一家之言,尤其在甲骨文和青铜器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尤为卓著,堪称独步。

陈梦家先生在青铜器方面的研究成就,以前仅知的是在著录方面主要体现在《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④和断代研究《西周铜器断代》等。这些成就的取得与陈梦家先生在美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1944年在金岳霖和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推荐下受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现称东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教授古文字学一年,为搜集整理流落海外的中国青铜器资料,归国延期至1947年。这段历史不仅对陈先生的学术历程至关重要,对整个中国青铜器研究史也意义深远。

陈梦家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后驰骋于诗史两界,均卓有建树。在史学方面,早年师从闻一多先生专攻古文字学、古史考证,1934年起在燕京大学师从容庚先生,开始接触到青铜器研究。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旅欧归来,将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的照片资料委托陈梦家编纂,1946年出版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辑^⑤,第二辑因内战未得出版,稿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⑥,因仅限于照片资料,书中所列只是器物照片和器名,真假相掺。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② 分六次连续发表在《考古学报》第9、10册及1956年第1~4期。

③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

⑤ 陈梦家编纂:《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出版。

⑥ 参见曹菁菁:《新发现〈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未刊稿》,《文献》2014年第4期。

1944~1947在美的三年,陈先生在青铜器研究方面取得非凡成就,除已在国内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外,还有在国外出版的图录、发表的文章以及未刊手稿。1946年与芝加哥美术馆东方部主任凯利(Charles Fabens Kelly)合作,为芝加哥美术馆藏有的中国青铜器编制了图录《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ckingham Collection*)^①,用英文在西方发表的论文Shang Culture^②, Style of Chinese Bronzes^③, Malcolm's K'ANG Hou Kuei and its Set^④, The Greatness of Chou^⑤,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⑥,英文手稿Some Notes on Chinese Bronzes^⑦, Cultural Cooperation^⑧。最重要的是,在被抄家掠走后归还至考古所的稿件中,还发现了陈梦家先生由美国带回的英文手稿《美国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和中国铜器综述》(*Chinese Bronze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 A Catalogue and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原来《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只是其中的图录部分,与之相映照尚有分为十五章的文字部分《中国铜器综述》^⑨。根据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社科院考古所、哈佛燕京学院(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芝加哥大学(Chicago University)、美国各大博物馆等处查得的档案得知,手稿原计划在美国出版,打印装订成两份,一份留在哈佛燕京学院预备出版,一份由陈先生带回国内。陈先生于1947年回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美无外交关系,出版一事被搁置,由于人事迁衍,留在美国的手稿也无下落。除这项工作外,关于流落海外的青铜器资料收集工作他还完成了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 Toronto)所藏中国青铜器资料的收集工作,并已着手收集欧洲部分的资料。原计划是把流落于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中国青铜器资料冠以《中国铜器综录》在国内出版,《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只是计划中的第二辑。

《中国铜器综述》与图录《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相表里,分

① Charles Fabens Kelly and Ch'en Meng-chia.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ckingham Collection*. Chicago: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946.

② A lecture given at the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of Chicago, April 15, 1946.

③ Ch'en Meng-chia. Style of Chinese Bronzes.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I*, 1945-1946.

④ Ch'en Meng-chia. Malcolm's K'ANG Hou Kuei and its Set. *Oriental Art, Autumn* 1948.

⑤ Ch'en Meng-chia. The Greatness of Chou, *China*. edited by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1.

⑥ Ch'en Meng-chia.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Bicentennial Conference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April 2, 1947.

⑦ 从内容看为一演讲稿,未见发表。

⑧ 从内容看为一演讲稿,未见发表。

⑨ 陈梦家著,王睿、曹菁菁、田天、孙莹莹译:《中国铜器综述》,待刊。

为十五章，系统总结了青铜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使传统方法与考古学最新成果相结合，同时也吸收了某些西方学术成果，是继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①《商周彝器通考》^②之后有关青铜器研究的又一突破。

《中国铜器综述》^③共分方法和材料、历史背景、相关出版物、考古发掘和发现、地域分布、术语、分类、类型学、古文字学、铭文、铸造和作伪、文化背景、编年、风格和纹饰及年代十五章。此前尚有两部性质相同的著作，1941年出版的容庚先生所著《商周彝器通考》的上编和1946年出版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所附陈先生撰写的《中国铜器概述》。《商周彝器通考》的上编由原起、发见、类别、时代、铭文、花纹、铸法、价值、去锈、拓墨、仿造、辨伪、销毁、收藏和著录十五章组成，是对此前与青铜器相关的文献记述、著录、研究、发现等方面进行的全面整理，是对整个青铜器研究资料的汇集。其中的“类别”一项，突破历来青铜器按自铭和史籍题铭的传统，第一次按照用途把青铜器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及杂器、乐器。《中国铜器概述》分时期、地域、国族、分类、形制、文饰、铭辞、文字、铸造和鉴定十章，开篇把青铜器分为五期，第一期商、商周之间、周初；第二期西周全期；第三期平王东迁至春秋之终；第四期春秋之终至秦之统一；第五期秦及两汉全期。在不同期别中述及青铜器在地域分布、国族迁移中的器群变化，并在类别、形制、文饰、铭次、文字、铸造等方面来列举青铜器的变化和特点，在青铜器分类上取用《商周彝器通考》“类别”中的分类标准。

《中国铜器综述》是对《中国铜器概述》全面的修订和扩充，只是在论述逻辑顺序上调整为先分析青铜器的时代特点后得出青铜器分期的结论，分期更为细化合理，把青铜时代划分为1.商2.西周（早、中、晚三期）3.东周a.春秋（早、中、晚三期）b.战国（早、中、晚三期）4.汉a.西汉b.东汉。同时也吸收了《商周彝器通考》青铜器研究史方面的内容。第二章“历史背景”分为商、周两部分，曾各自发表过，是对商周史的一般性叙述，属于研究对象的背景资料。第三章“相关出版物”和第四章“考古发掘与发现”两章与《商周彝器通考》的“原起”与“发见”相类，是对青铜器研究史的回顾，充实了国外对中国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部分。

《中国铜器概述》各章均围绕青铜器断代问题进行阐述。第一章“方法和材料”首先阐明主旨：“任何青铜器都不是孤立的，都有以下特征：时代、地域特点、属于某一社会阶层、器形、装饰和铭文特点。我们可凭借有明确年代和出土地点的青铜器来判断其他青铜器的年代，这种方法和结论可由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研究成果、

① 此书最早刊布于日本，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文求堂，东京，1932年。后屡有改订，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②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

③ 陈梦家著，王睿、曹菁菁、田天、孙莹莹译：《中国铜器综述》，待刊。

并与其共存的陶器、玉器、石器 etc 器物特征进行比较和修正。我们应该首先确定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和年代，收藏者、著录情况和铭文所记载的历史。再根据器形、纹饰和铭文来判断它与其他青铜器的关系，如果铭文与其他青铜器有联系，把它们作为一‘组’来研究。”第五章“地域分布”，借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的做法，注意到青铜器的地域特点，对商周时期的国家地域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做文献上的梳理。第六章“定名”、第七章“分类”、第八章“类型学”可以划为一组，先论述青铜器各部位的定名原则，再论分类标准，在此基础上阐述48类青铜器在不同时代器形变化情况，为断代做基础。第九章“古文字学”、第十章“铭文”为一组，从中国文字起源、发展历史及文字的六种造字方法谈起，阐述铜器铭文在不同时期、地域呈现的不同书写特点，铭文铸造的不同方式，商周时期铜器铭文在内容上的差别。第十三章“年代学”为青铜器的发展史构筑一个年代框架，第十四章“风格和纹饰”阐述青铜器在不同时代呈现的不同风格，第十五章“分期”把青铜时代从商至东汉划分了期段，整个青铜器发展史的时空框架构筑完成。

这部巨著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今天需要修正的只是某些具体结论。图录的编写如《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和青铜器断代研究如《西周铜器断代》都是建立在这一深厚研究的基础之上。

对流落海外的青铜器资料，中国学者经历了无能为力的困窘。中国文物开始大量外流始于清朝末期，随着国势颓微，西方势力的渗透，如容庚先生所言：“军阀攘祸，国无宁岁。关洛之民，困于饥馑，或掘虚墓，取所藏以救死，政府莫能禁。异邦之民，挟其多金，来相购取。于是古器之流出遂如水之就壑。”而海外对中国青铜器的著录与研究也随着收藏的增多而兴起，西方最早收藏中国青铜器的人士之一为意大利人塞努奇（Henri Cernuschi, 1820-1896），于1871年利用在北京旅行机会购得大批青铜器，其中两件为《西清古鉴》所著录，现存于巴黎塞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①。最早的非汉语中国青铜器图录是1848年日本出版的《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②。

中国学者对流落海外青铜器资料的收集、刊布工作，与其说出于研究资料的缺如，不如说是这项工作触动了其敏感的民族情结，在民贫国弱的现实压力下，使这类工作掺杂着浓重的爱国情绪。陈先生撰文：“看到我们自己国家如此精绝的历史文物毫无保障的被异邦攫取了，是我们莫大的耻辱。在考古学上遭到的损失，更是无法补偿，我们要根据这种惨痛的经验，深深认识到被人剥削的憾恨，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

① Thoms Lawton. Chinese Ritual Bronzes: Collections and Catalogues Outside China. edited by Stephen D Owyong,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in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 St. Louis: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 1997: 17-37.

② 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8页。

热忱。”^①此项工作的开始是罗振玉于民国九年（1920年）发刊的《海外吉金录》，收录了其在日本所闻见的青铜器目，得二百零五器，只有器名与藏家，只能作为目录查阅^②。1935年容庚编的《海外吉金图录》^③专收流散日本之中国青铜器，共计一百五十件，资料主要来源于日本的铜器图录。每器附照片，列有尺寸，描述，以前的著录情况、断代，连尺寸与重量单位亦采用日式，只是在器物断代上略有改正。而对于西方中国青铜器的收藏情况，容庚先生感喟“昔日本梅原末治教授游历欧美，公私收储之府，莫不倾其所有以相示。君乃照其形制，量其修广，录其所睹闻，以成《殷禁之考古学的考察》及《欧美收储支那古铜器精华》。余于域外之文，一无所晓，乃从他人著作中彙辑而为此书。余甚惭于梅原。国中独无其人乎？此所为抚卷踌躇者也。”^④

1944年陈梦家到美国后，势如出弦之箭，甫就致信顾立雅（Herrlee Creel）：“我在此间的目的是能继续我先前的研究并有机会考察你们国家收藏的青铜器和甲骨，您是否能为我介绍那些收藏家和博物馆负责人员，以便和他们电话联系。”1945年4月正式向哈佛燕京学院（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申请经费为编写美国所藏的中国青铜器目录做资料的准备，然后陈先生向美国各大博物馆寄送查询所藏青铜器资料的表格，在古董商人卢芹斋的帮助下又与众多的私人藏家建立了联系。在美的时间由一年延长至三年。

从1946年2月开始，陈梦家先生几次到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集整理安阳和洛阳金村出土的资料。1947年8月2日至9月4日，他寻访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和瑞典的公私收藏，搞清了当时欧洲的中国青铜器收藏情况。从1944年10月24日陈梦家夫妇在洛杉矶登上美国本土至1947年9月19日陈先生由旧金山乘船回国的三年时间内，为收集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资料，他多方寻求经济支持，不仅获得了丰厚的资料，也使青铜器的著录方式和研究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所录仅是流落在美国的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资料占有的详尽与准确已远远超过同类的《泉屋清赏》。它的价值不仅记录了遗失海外的一批珍贵资料，更重要的是利用了三四十年代青铜器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现代考古学类型学方法对传世和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彻底的整理并进行了有机串联，是青铜器著录学的一场革命。

青铜器的著录史可以追溯至宋代，现存最早的当推吕大临的《考古图》，图像与铭文并重，备载大小、容量、重量及出土之地和收藏之人，后者悉遵此书矩矱，后又出现专门著录铭文之作。由于这些图录主要用于示密和证经补史，细审之，则印证了

① 陈梦家：《中国古代铜器怎样到美国去的》，《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1期。

② 罗振玉：《海外吉金录》，《永丰乡人杂著》（第三册），1922～1923年刻本。

③ 容庚：《海外吉金图录》，考古学社专集第三种，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印行。

④ 见容庚：《海外吉金图录》序，考古学社专集第三种，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印行。

郭沫若所言“……著录之书，自赵宋以迄于今，颇多名世之作……然其著录之方，率以器为类聚，同类之器以铭文之多寡有无为后先，骤视之虽若井井有条实则于年代国别之既明者犹复加以淆乱。”^①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青铜器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研究范畴，不再限于器物的辨伪断代和为证经补史所做的铭文研究，其标志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商周彝器通考》的出版。1931年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首创的“标准器”法被认为是青铜器研究史上的最大突破，它把有关联的铭文集合在一起，以有确切年代的青铜器作为其他断代的标准，“……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怀若何之成见，亦不据外在之尺度。盖器物年代每有于铭文透露者……而由新旧史料之合证，足以确实考订者，为数亦不鲜。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他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得此，更就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紋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物大抵可以踪迹，即其近是者于先后之相去要必不超远。至其有历朔之记载者，亦于年月日辰之相互关系，求其合与不合，然此仅作为消极之副证而已。”^②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在青铜器资料的整理中把这一最新研究成果与传统方法结合起来，它共收845器，一器一号，每号有八项说明：（1）图像曾经著录的。（2）铭文曾经著录的。（3）记录器物的高度、口径、宽度和长度。（4）记录铭文的行数、字数并其隶定的释文。（5）断定年代。（6）记录器物出土后收藏者和商贾的收藏和出售。（7）现在的所在，在博物馆或私人处的。（8）①器物的现状；②相传出土的时代与地点；③同群同同组的铜器，同族名的铜器；④简要的有关铭文考释；⑤形制、花纹上的特点及与其他器的比较；⑥其他不属于以上七项的记述。记录项目基本继承了青铜器著录传统，完整反映了青铜器的流传情况，研究史和保存状况，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陈先生在谈到青铜器研究的方法与材料时，“我们首先要搞清青铜器出土的地点与年代，收藏者和被著录情况，以及铭文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在从器形、装饰纹样和铭文风格来推断它与其他青铜器的关系，如果铭文与其他青铜器有联系，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一‘组’来共同研究。”^③前七项条目正是陈先生所谈青铜器研究需要的必要准备，第八项的“同群同同组的铜器，同族名的铜器”正是“标准器法”的体现。“关于铭文内部的联系又可以有以下各类：同作者者；①同时人；②同父祖关系；③同族名；④同官名：a.同事b.同地名c.同时”，这些条目正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所开创的“标准器”法的串联线索，用这种新的方法对图录中的铜器的传世和新出土的资料进行了彻底的整理，使分散的铭文内容

①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②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③ 见陈梦家著，王睿、曹菁菁、田天、孙莹莹译：《中国铜器综述》第一章“方法与材料”，待刊。

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为研究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体现陈先生学术贡献的《西周铜器断代》的每一结论均是在此项工作基础之上进行的。“同族名的铜器”,在认同商代铜器上的图形文字为族徽的基础上,铜器的串联扩充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所忽略的殷代铜器上。它对后学的启发意义深远,做青铜器研究之所以能探讨地望、历史沿袭、王与侯伯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都是利用这种方法对零散资料进行整合的基础上进行的。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对青铜器断代法虽有开创之功,但仍以铭文为中心,并未在器形研究上创通条例,使大量无铭或铭文释读困难的铜器断代成为问题。出版于1941年的《商周彝器通考》中的《类别》一章,则是第一次按照用途把青铜器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及杂器、乐器,突破历来青铜器按自铭和史籍铭辞的传统,结束了青铜器命名的混乱状况,这虽然在青铜器个案研究中忽略了不同类别的青铜器在同一礼仪活动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但在梳理大量的传世青铜器资料中作用重大。《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在器物编排上把青铜器分列于《商周彝器通考》的分类标准之下,“按照器物的品类分列的,所以A1-A117都是鼎。又据其形制的不同分为九种,即‘鼎一’至‘鼎九’,如‘鼎二’是分档鼎,‘鼎三’是方鼎”。细查之,在每种之下,又是按照时代先后排列的。松丸道雄先生认为“分类是本书(《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的精髓”^①,得益于《中国铜器综述》的第八章“类型学”和《中国铜器的形制》^②才恍然大悟,隐匿于这种排列精当之后的是方法论的支持,陈先生把现代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引入青铜器研究,与铭文研究结合起来,使图录做到了在年代和国别上真正的“井井有条”。

类型学是现代考古学三大基础理论之一,是“研究物品(包括遗迹和遗物)外部形态演化顺序的方法论”^③。1903年由瑞典人蒙特留斯系统总结了其理论原理,1935年翻译介绍到我国^④,我国现代考古先行者从30年代开始运用类型学原理来研究发掘出土的资料到运用器物的分型分式法、根据出土物共存关系来判断各遗存单位年代的组合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过程。1930年梁思永研究山西西阴村的仰韶文化陶片时进行形态分类,把不同形态的口缘、器底、柄与把,分别给予一定的符号,根据不同差别,分用四层符号来标记,但对陶器局部形态的这种细致分类,并不能综合成一种

① 见《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的日文版《殷周青铜器分类图录》松丸道雄所作序文,汲古书院,1977年。

② Ch'en Meng-chia. Style of Chinese Bronzes.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I, 1945-1946.

③ 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④ 郑师许、胡肇椿译:《考古学研究法》,《学术世界》(第一卷2~6期),1935年。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出版社,1937年。

仰韶文化陶器的完整概念^①；李济先生在整理安阳殷墟出土的陶器和铜器时，也尝试应用类型学方法^②；裴文中先生《中国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试图勾勒出鬲与鼎从仰韶文化到商周时期的演变轨迹，这是寻找考古类型学原理的表达方式的探索阶段^③。1948年，苏秉琦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中根据陶鬲的制法、形式和外表的差别，归纳成袋足、折足、矮足三大类和袋足类内的锥脚、铲脚两小类，又按照各类鬲在形态、附饰和制法上的细部特点，把40件分属于三大类、四小类的鬲归纳成九组。类别表现了形态变化的不同轨道，组别则为形态早、晚之异^④。这在探讨器物早晚、考古学文化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序列等问题上行之有效，尚缺乏一种明晰、标准的表达方式。而陈先生早在1947就已把成熟的标准化的类型学方法运用于青铜器研究，运用器物的分型分式的方法，型是分类，式代表器物在时间上的发展顺序。

“我要探讨48类青铜器的型式问题。48类铜器的划分主要依据‘自铭’和‘功用’，这章主要分析每类的型式演变和它们之间的异同。每一类首先列举器主要特征，然后列出其下的各种类型，有些型还要细分出亚型并说明它们的差别。I、II等代表型，Ia、Ib等代表亚型。型式的排列不只是依照年代顺序，有时还兼顾了讨论的便利”^⑤。在《中国铜器的形制》中以卣为例，根据提梁的形状、梁的末端有无牺首、提梁安装的形式及其方向，盖纽的形状、花纹等要素组成，又论证了诸种型式之间的承袭、衍变及其发展，然后从铭文方面加以断代，推断出各个型式的年代。

难能可贵的是陈先生还注意到了同一单位的器物组合关系，如注重“同出于某一地区的同出于某一个坑的同出于某一墓葬的”关系，突破并挣脱了传统方法的园囿，使青铜器的研究得到了提升，也奠定了现代青铜器的研究基础。这种方法在考古学领域的成熟运用，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开来。但由于人事迁衍，《中国铜器的形制》不为中国学者所知，《中国铜器综述》一书未得出版，对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一书器物的排列精当不知其所以然，也使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丢失了精彩的一笔。

现代考古学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通过田野发掘带来的大量古代遗存资料，更重要的是它的方法论为传统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新视点，董作宾的殷墟卜辞研究和陈梦家的青铜器研究可引为范例。考古学的影响在

① 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问题——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③ 裴文中：《中国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④ 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问题——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⑤ 陈梦家著，王睿、曹菁菁、田天、孙莹莹译：《中国铜器综述》第八章，待刊。

陈先生的青铜器研究中随处可见，他认识到器物出土地点和时间等背景资料的重要性，“当我们开始研究一件青铜器，应该首先搞清它的出土地点和时间”，重视遗迹单位的器物组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的认识在新材料和发掘成果、从文献上得到的新认识和与青铜器相关的陶器、玉器、骨骼和石制品的对比中得到提高”，由此他认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保存的安阳和洛阳金村的材料比美国的零散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原因。“每一型式都有很长的演变过程，或多或少带有手工制作的性质，所以每一类型的年代是相对的。某一时间段内会存在多种类型的现象非常普遍，是因为技法的传承旧式审美的延续。因为无论工匠还是拥有者总有保守和前卫之分，所以当新式产生时旧式还在使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深刻认识，是我们在研究中要时刻提醒自己的。

1938年陈先生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提到“虽然从事国学，我自己往往感到许多缺欠，而尤其是国学不仅是整理旧典籍和材料，更重要的是新方法以及别国材料方法的借镜。最近看增订的《金文编》，材料加多了，编制考释一仍吴大澂之著……所以我常时时警惕自己，我们生于吴、孙、罗、王之后，我们所从事者为古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考据学的汇合，有前人为我们准备道路的（如清人的注疏，二王之王），但我们今日不但是继承之，而是发展为新的。我们读先生的《胡适文存》，觉其最大的价值在承清儒之深而开新学之端，而我看近今的学者承此潮流而发扬的固多，仍然覆导清儒故辙而不改者甚是不少，则是这类学问不是不增加价值，而是不变新，不创造。我常想及此，总想对于典籍材料稍稍涉猎后，要再去训练自己的新方法新态度，而研究古代文化，西洋的考古学人类学尤为急需。……我倘肯甘心老死于中国式学者之事，倒也罢了，但我总觉得自己处此际会，也极难得，总可以尽其所能略有责于学术。”^①陈先生洞悉传统研究方法的弊病，苦恼于寻找新的研究途径，正是具备了古史学、古文字学的深厚基础，又不满足旧有的研究方法，在赴美之行的催化下，成功地把考古类型学引进青铜器研究，完成了“有责于学术”的夙愿。

陈梦家先生的美国之行不仅把他的学术专著和“四大箱流落于西方的中国文物资料”带回中国，还建立了中西方学术交流的通道。他与当时的西方著名汉学和中国美术史专家如美国的史克门（Lawrence Sickman）、顾立雅、巴克夫（Ludwig Bachhofer）、谢门李（Sherman Lee），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加拿大的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英国的叶慈（Percival Yetts），法国的勒维（Sylvain Levi）有着频繁的学术往来。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在同一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目的、方法和结论，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一致，但有必要保持学术信息与交流的畅通，这也不仅对中国学者有益。

^① 杜春和等：《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殷墟文化的多样性——以陶质类容器为视角

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南安阳市西北部的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的王朝都城所在。以殷墟晚商遗存为代表的殷墟文化是商代晚期商文化的代表,学界以殷墟文化的典型内涵为标尺,从而对晚商文化的分布、类型以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互动等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入。

史学大师王国维对殷墟甲骨卜辞研究,证实《世本》《史记》等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商王世系是可信的^①,《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灭国“更不徙都”之说是可靠的。董作宾先生把殷墟甲骨刻辞分为五期,并推断了各期与商王及王世的对应关系^②;考古学家基于殷墟考古的研究,将殷墟文化分为前后相继的四个时期^③,其中殷墟第1期晚段至第4期可与殷墟甲骨卜辞的分期大致可相对应,即相当于商王武丁到帝辛时期,第1期早段则早于商王武丁,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

殷墟文化的主要物质形态,包括各类遗迹(房基、窖穴、墓葬)和遗物(甲骨、铜器、陶器、玉石器、骨角牙器、蚌器等),但其中最丰富、富于变化的是各类遗物,又以陶器、铜器为最,由此构成了殷墟文化丰富而多彩的多样性特点,这种特点具体表现在材质、形态、群组等多个方面。本文以陶质类容器为视角,探讨殷墟文化的多样性。

① 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第九卷),中华书局,1961年。

②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年。后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2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③ 学界关于殷墟文化的分期以邹衡、郑振香两位先生的分期最为系统。两位先生有关殷墟的分期序列完全一致,都分为4期7段,只是各段到期的分合略有差异,如邹衡先生所分殷墟1期相当于郑振香先生所分的殷墟1期早段。由于殷墟遗址正式的考古报告均采用郑振香先生的分期体系,本文所指殷墟的期、段同于郑振香先生的分期标准。见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4期,又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部分第二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一、殷墟文化的多样性形态

殷墟文化的多样性,表现为材质、形态与组群等多个方面。

1. 按材质分类

以材质为视角研究古代文化,是考古研究中最常用的分类和研究方法。以往有关殷墟考古研究中,前辈学者对此方面多有关关注,取得了不少成果^①。如李济先生对1928~1937年殷墟早期考古出土的陶质类标本研究中,从质料、分类、颜色与形制、制造痕迹、纹饰、符号与文字等方面做了研究^②,有关标准对后续研究具有标杆意义。

殷墟文化陶质类遗物,一般可分为粗泥陶、白陶、硬陶、原始瓷、釉陶等组。

(1) 粗泥陶

粗泥陶是最多的一类。包括殷墟在内的各地陶器应该是使用本地黏土制作的。中原北方各地地表常见马兰黄土和次生黄土等黏土。有学者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的灰陶、红陶化验得知,泥质灰陶、红陶所用的陶土并不是普通的黄土,因为绝大多数灰陶和红陶的化学组成与纯黄土有显著区别,而与红土和沉积土(次生黄土)一致;泥质灰陶多为食器,陶土一般较纯净,也有含沙的,但含量低,只有1%~2%,颗粒较细,大概不是有意加入的,而是原来就存在于陶土中的^③。但有学者通过大量标本的观察和化学分析认为^④,商周时期,最常见的普通陶器是就地挖取的易熔性黏土制作的,其中含 Fe_2O_3 较高,烧成温度在800~1000℃。后有学者对殷墟陶器标本检测分析,认为殷墟的制陶原料不仅有次生土,还包括马兰黄土^⑤。最后一种认识更准确。

① 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后收入《李济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捌章第一节,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②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的“殷墟陶器研究”部分,《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

③ 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④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3期,6、7页。李家治:《原始瓷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132~145页。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第二章,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 James Stoltman、荆志淳、唐际根、George(Rip)Rapp:《商代陶器生产——殷墟、洹北商城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殷墟陶器的质地可分为夹砂、泥质两类。夹砂陶又可分灰、红、褐、黑陶，其中灰陶有灰、浅灰、深灰之分；褐陶多不纯正，局部或呈红褐或灰褐色。泥质陶又可分灰、红、褐、黑皮陶，其中灰陶也有灰、深灰、浅灰之分。

李济先生对1928~1937年间殷墟15次发掘采集的陶质类器物残片作了分类统计（不包括完整和可复原器），其中灰陶占绝对优势，有90.07%；其次则是红陶，占6.86%，远少于灰陶；其余的3%左右则包括其他四种类型，即硬陶和釉陶4290片（1.73%）、黑陶2655片（1.07%）、白陶663片（0.27%）和彩陶1片^①。《殷墟发掘报告》第四章第二节^②说，陶色主要是灰、红两种，灰色数量最多，有深灰、浅灰之分；红色较少，一般多呈砖红色；只有少量近棕色。泥质陶中的灰色陶，其中第1、2、3期所占比例大体接近，红色陶从早到晚逐渐增多。夹砂灰陶，含细沙的较多，含粗沙的较少，一般地说，两者都由早到晚逐渐减少。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总结1990年以前殷墟考古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认为^③，殷墟出土的陶器，按其质料不同可分为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白陶、硬陶、釉陶等。在各不同发展阶段都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夹砂红陶很少，泥质红陶在第1、2期为数不多，到第3、4期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泥质灰陶颜色有深有浅，以深灰色的为主，色泽一般较匀。泥质红陶第1、2期的火候较低，多呈橙黄色，第3、4期的火候较高，呈砖红色。夹砂灰陶多数呈灰褐色，或深灰色。夹砂红陶多呈红褐色。

笔者对孝民屯出土30多万片陶质类器物残片统计^④，殷墟陶系与以前有关统计结果相近，陶系比率始终以泥质占绝对优势，占近90%左右，夹砂陶在10%左右，这与早年李济先生的统计接近。泥质陶中，红陶比例在上升，2晚时在10%以内，3晚增加到10%以上，4早上升到20%以上，灰陶相应比例下降。四期灰陶中，浅灰色陶比以前略多，还有部分灰中泛黄；红陶2期晚段的表面常泛紫，3期者多为橙红色，四期者大多为砖红色。

殷墟日用陶容器绝大多数表面有纹饰，纯粹素面的很少。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弦纹次之，另外有附加堆纹、三角绳纹、三角划纹、云雷纹、方格纹、联珠纹、兽面纹、乳丁纹、涡纹、戳印纹以及素面等。

（2）白陶

白陶是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特型器具，以本地瓷土类黏土为材料制作而成，

①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第二章，《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
李济：《小屯殷代与先殷陶器的研究》，《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339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④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殷商遗物》的陶器部分，文物出版社，待刊。下文所引孝民屯资料不再注明。

商代晚期以后被原始瓷替代。殷墟白陶呈纯白色、乳白色,制作相当精致,胎质纯净,白而细腻,质感远胜于普通陶器,制作工艺代表了中原北方地区白陶的最高水平。检测可见,殷墟白陶化学组成则与北方地区的瓷土相同,具有低 SiO_2 、高 Al_2O_3 、低 Fe_2O_3 的特点^①。白陶的胎质硬度接近普通陶器,远低于硬陶和原始瓷^②。殷墟白陶的烧成温度大致同于普通陶器或略高^③,远没有达到硬陶最高达 1100° 、原始瓷达最高 1200° 的温度。

殷墟所见白陶比粗泥陶少,但远比硬陶、釉陶、原始瓷多。在殷墟,白陶大多出于大墓和中型墓中,遗址中极少发现。如30年代在侯家庄西北岗的大墓和小屯少数较大的竖穴墓中,共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白陶容器10多件,陶埙1件,残片663片^④。侯家庄北的一座墓在30年代末曾被盗掘,据说曾出土白陶片五六筐,故当地农民称为“白陶坑”,1978年,发掘时还出土白陶820片^⑤。

殷墟白陶的器类有簋、豆、爵、觥、盂、壶、甗、罍、罐、大口尊和埙等^⑥,其中容器的形态或与殷墟发达的青铜器非常相似,器表或雕刻有青铜器上常见的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弦纹等精美花纹,或与普通陶器非常相似,器体或饰绳纹、弦纹。毫无疑问,殷墟白陶是本地制作的,绝大多数器类是仿制青铜器和普通陶器的。

(3) 硬陶、原始瓷

硬陶、原始瓷可归为一大类,数量很少,几乎为残片。主流观点认为它们应该是从南方输入的^⑦。硬陶和原始瓷的胎质明显比普通陶器薄、硬而细腻,胎色也浅,其中硬陶多为灰白色,原始瓷多为浅灰色。硬陶和原始瓷的胎料是相近的,差别是前者

①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表10,《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
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纹陶、原始瓷烧造地区的探讨》,《考古》1993年第10期。

②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表29,《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

③ 申斌:《殷代白陶的物理研究结果》,《殷都学刊》1991年第3期。

④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13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36、39页。

⑥ 李济:《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年。又见李济:《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和《李济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228~240页。

⑦ 李家治:《原始瓷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罗宏杰、李家治、高力明:《北方出土原始瓷烧造地区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96年第3期。罗宏杰、李家治、高力明:《北方出土原始瓷烧造地区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96年第3期。陈铁梅、PappG.Jr、荆志淳、何弩:《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的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156页。

大多使用原生料烧制，胎质杂、粗糙，其中或有较大的石英颗粒，后者的胎料经过淘洗，胎质明显细腻，有的或加有细沙类掺和料；前者表面没有施釉，后者有釉。原始瓷器的釉层很薄，部分标本的釉层与胎结合不紧密，或有脱落。其中硬陶和原始瓷的化学组成表现为高 SiO_2 、中 Al_2O_3 、低熔剂 R_xO_y （主要是 Fe_2O_3 ）的特点，这与南方产瓷石类黏土基本相似，而与北方地区瓷土的化学组成不同^①。观察出土标本所见，硬陶和原始瓷为灰胎，其中原始瓷为浅灰胎；釉陶为紫色胎。原始瓷的器表有很薄的釉层，釉色多为浅褐色，褐中微带绿；硬陶无釉，表为灰色；釉陶的釉色较深，近酱色，有的深处近黑色。纹饰有小方格纹、叶脉纹、水波纹、戳印纹、云雷纹、弦纹等。

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所见完整和可复原者不过数十件，器类有甗、豆、壶、钵、罐、器盖等。对殷墟硬陶何原始瓷标本所做检测分析可见，到殷墟4期晚段，这类器物的来源与之前有所不同^②。如果从文化风格观察，殷墟的硬陶、原始瓷也明显存在阶段性差别，其中殷墟2期到4期早段特征一致，到殷墟4期晚段，在器类、釉色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其中殷墟2期到4期早段，硬陶、原始瓷的器类主要为甗，数量最多，同时期釉陶器类有甗；其他器类很少，且数量更少。殷墟4期晚段，硬陶、原始瓷的器类明显增多，除原有的甗、罐外，还有豆、壶、钵，其中罐的形态更多样化，豆的形态明显与西周早期接近。殷墟2期到4期早段，原始瓷只有在器表的口、肩等部位施釉，釉色比较统一，多为褐色，褐中微带绿；4期晚段者，施釉部位下及器体中、下腹，有的器物如罐还在体内口至中腹施釉，釉色也多样化，有淡绿、黄绿、深绿色、酱紫色等。

（4）釉陶

以往有关殷墟原始瓷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将原始瓷或称为釉陶^③。据有关介绍和对部分标本的观察可知，这类器物就是现在学界所公认的原始瓷器。那么，商代是否存在釉陶呢？仔细对比殷墟有关标本所见，当时确有一种带釉的陶器，胎质较硬，胎色为紫红色，器表外有薄釉，釉色或呈酱紫色（局部近黑色），或为铁灰色。观察所见，它的胎料应该是非瓷土类黏土，而是一种胎质深红、含铁量高的黏土，与硬陶、原始瓷的胎料有明显区别。所以，将这种用普通黏土制作并施釉的陶器归入硬陶或原始瓷是不合适的，可归于釉陶类。殷墟釉陶更少，所见纹饰与硬陶和原始瓷相同。

① 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纹陶、原始瓷烧造地区的探讨》，《考古》1993年第10期。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第三章，科学出版社，1998年，110页。

② 陈铁梅、Papp G. Jr.、荆志淳、何弩：《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

③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小屯》（第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228～240页。